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

方 志 远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方志远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5 重印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4145-0

I. 明… II. 方… III. 市民文学—文学史—中国—明代
IV. 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844 号

书 名 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方志远

责任编辑 陈志刚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353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145-0/K · 1729

定 价 34.00 元

四摇秦建築構件
摇摇(採自徐衛民《秦都城研究》)

目摇摇录

第一章摇绪论·····	员
第一节摇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及城市人口的构成·····	圆
第二节摇明代市民文学研究的对象·····	猿
第三节摇圆世纪明代市民文学整理与研究的回顾·····	源
第二章摇明代的城市与市民·····	猿
第一节摇明代的城市及其地域性差异·····	猿
一、明代城市的层次与类型·····	猿
二、经济文化数据所显示的城市地域性差异·····	源
三、文献记载所表现的城市地域性差异·····	缘
第二节摇文献记载中的明代市民·····	远
一、城市知识分子·····	怨
二、工商业者·····	怨
三、妓女、游民及其他身份的市民·····	员缘
第三章摇明代市民文学的主要品种及其发展的阶段性·····	员愿
第一节摇明代市民文学的主要品种·····	员愿
一、白话小说·····	员怨
二、戏剧·····	员园
三、民歌时调·····	员愿
四、说唱词话·····	员愿
五、笑话、打油诗、嘲讽曲、民谚民谣·····	员猿
六、文言传奇、志怪及其他市民文学·····	员猿

第二节 明代市民文学发展的阶段性	猿园
一、市民文学的发展阶段	猿园
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市民文学的阶段性发展	猿怨
第四章 明代市民文学的创作者	猿园
第一节 明代市民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	猿园
一、白话小说作者	猿园
二、戏剧作者	猿源
三、说唱词话、民歌时调等品种的作者	猿园
四、诗歌作者	猿远
第二节 明代市民文学创作者的地域分布	猿员
一、白话小说作者	猿员
二、戏剧作者	猿缘
三、科举时文作者	猿远
第五章 明代市民文学的传播者	猿源
第一节 明代市民文学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传播方式	猿源
一、市民文学创作和传播方式的演进	猿源
二、市民文学的文本传播者与传播方式	猿园
三、市民文学的口头传播者传播方式	猿怨
第二节 明代市民文学传播者的地域分布（以文本文学为例）	猿园
一、市民文学传播者及其作品的地域分布	猿园
二、市民文学文本传播中心的转移	猿园
第六章 明代市民文学与明代社会	猿缘
第一节 明代市民文学中的明代市民（以“三言”、“二拍”为例）	猿缘
一、商人（附工匠）	猿远

二、士人	猿苑
三、妇女	猿源
四、官员及吏员	源员
五、其他身份的市民	源愿
第二节 摇市民文学对明代社会干预	源园
一、市民文学所揭示的市民社会	源园
二、市民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影响	源员
表 圆原员 明代乡试各省名额变化表	源
表 圆原圆 明代进士分布表	缘
表 猿原员 现存明版市民文学品种及版刻时代表	员园
表 源原员 各种身份作者在各类市民文学作者中所占百 分比	园园
表 源原圆 明代白话小说作者地域分布表	园员
表 源原猿 明代杂剧作者及作品地域分布表	园缘
表 源原原 明代传奇作者及作品地域分布表	园苑
表 缘原员 明代市民文学版刻地域分布表	猿员
表 缘原圆 明代南直隶(应天府除外)市民文学版刻地域 分布表	猿园
表 缘原猿 明代浙江市民文学版刻地域分布表	猿源
表 缘原原 明代福建市民文学版刻地域分布表	猿缘
表 缘原缘 明代南直隶苏州府市民文学版刻分布表	猿远
表 缘原远 明代南直隶常州府市民文学版刻分布表	猿苑
表 远原员 “三言”、“二拍”中明代商人一览表	猿苑
表 远原圆 “三言”、“二拍”中明代小商贩及手工业者一 览表	猿园
表 远原猿 “三言”、“二拍”中明代士人一览表	猿苑

表 远原原“三言”、“二拍”中明代妇女一览表 猿源

表 远原缘“三言”、“二拍”中明代官员一览表 源圆

表 远原远“三言”、“二拍”中明代吏员一览表 源豫

表 远原苑“三言”、“二拍”中明代其他身份市民一览表 源怨

参考文献..... 源园

后记..... 源苑

第一章 绪 论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说：

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有个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场现形记》，有个刘鹗也正在做《老残游记》，有个吴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你要寻清末的时代文学的代表，还是寻吴汝纶呢，还是寻吴趼人呢？你要晓得，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何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①

王国维和胡适用他们各自特有的语言风格和审视眼光，在论述着同一个问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能够代表时代的文学，必然是对整个社会都产生强烈震撼和影响的文学。这种文学只能是大众的文学。在城市繁荣并且领导社会风尚和消费潮流的时代，则只能是市民文学。因为只有大众或市民的认同、接纳、参与，文学才可能对社会产生震撼和影响。时间的推移、朝代的变更，使人们对过去许多曾经是十分普遍又十分普通的人物和事情产生敬慕并将其神圣化。例如孔子、孟子，在当时不过是无数讲学教授中影响较大的教授。例如屈原、宋玉，在当时也不过是无数楚辞作者中影响较大的作者。例如《诗》，在没有成为“经”之前，也就是一些言情、记事的作品。例如王国维所说的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胡适所说的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在当时实为大众的或市民文学。而在明代，能够成为“一代之文学”的，也只能是胡适所说的以《水浒传》、《金瓶梅》等为代表的市民文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及城市人口的构成

从严格意义上说，城市“仅指由特许状或制定法所划定的城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市区域”。^① 但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则是泛指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它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区别于农村的最基本特征,在于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高度集中性和人口的高度异质性。

在中国古代,城市一般被称为“城”,这是中国初期城市大多先有“城”后有“市”的客观反映。《礼记·礼运》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吴越春秋》也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都指出了早期“城”的功能在于防卫,特别是在于保护君主的安全。

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可以得知,秦汉时期的人们都相信,夏禹时有“万国”,殷初有“三千国”,周初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初有“一千二百国”。这成千上万个“国”,其实就是成千上万个已经发生阶级分化的部落聚居点,而其中的一些聚居点——统治者的居住地,已经以“城”的方式出现。《战国策·赵策》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所说的“国”,实则就是城;所说的“立国”,实则就是筑城,或者是定都。

如果只有起防御作用的墙垣,那还只是“城”而不是城市;只有在城中或者城郊出现专供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市”,才构成城市。也就是说,“城”与“市”的结合才构成城市,“城市”的名称也才开始出现。《周礼·考工记·匠人》篇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说是

^① D. M. Walker: The Oxford To Low, 中译名《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2 页。

“营国”，实际上是“营城”，即城市的规划。政府机关的办公场所为“朝”，商人工匠的贸易场所为“市”。既有城，又有市，这才是城市。

被认为是夏都斟寻的著名二里头遗址，经过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被学术界认定具有早期都城的规模和内容。该遗址南北长约 2 000 米，东西宽约 1 500 米，中部为近 80 000 平方米的宫殿区。饶有趣味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实地测量的这个宫殿区遗址的面积，竟然和上引《战国策》所说的周围“三百丈”的面积相当。可见文献记载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在这个宫殿区内，有几十座长方形和方形的大小不等的宫殿基址被发现。考古学家们根据被发掘出的主殿基座廊柱，认为这是一座东西长 30.4 米、南北宽 11.4 米的由台基、木构屋架和屋顶构成的“四阿重屋”式的大殿。大殿的周围是廊庑，设有四个卫士室；前面是一个面积达 5 000 平方米的广场，可容纳上万人聚会或上千武士训练。中心宫殿区外，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区，其门类有冶铸、制玉、制石、制骨、制蚌、制陶、漆木作、酿酒、建筑等。遗址中还挖掘出一些并非当地生产的玉器、绿松石器等，这些器物如果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所掠夺，则必然是通过交换的手段所取得。^①

由此可见，斟寻是一个既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又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交易场所的早期城市。

《诗经·大雅·绵》叙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对早期周人国都岐的经营情况：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

^① 参见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载《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2 期。

作庙翼翼。揀之陧陧，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冯冯。百堵皆兴，簪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既有高耸的城墙，又有巍峨的宫殿，正是中国古都的典型标志。由于时属草创，而周人又以农业为主，所以在这首诗中尚无关于“市”的描述。后来的镐京、雒京则不同，不但有宫殿、城垣，而且有交易的场所。至于齐都临淄，发展到战国时，城中已有“大市”、“中市”、“右市”等，^①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为整个山东半岛乃至关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赵都邯郸、魏都大梁、燕都蓟城、秦都咸阳，也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当然，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也可以是另外一条途径，即先有“市”，然后才有“城”。如战国时期楚国的宛，由于地处汉水、长江、淮河三大水路与关中和中原沟通的交汇点，交通便利，遂为商人及手工业者的聚集地，并由此而成为远近农村的商品集散地及当时南北交通线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楚国出于治安和财政的原因，设立机构进行管理，于是也成了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史记》说：“南阳西通武关、郢（徇）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②宛是典型先市后城的商业城市。

此后中国的城市，正是按着这两种模式发展的。根据地位和功能的不同，中国古代城市又可以分为都城、省城、府（州）城、县（州）城以及市镇等不同级别，以及政治型、军事型、生产型、消费型等不同类型。不管是哪一级别或哪一类型的城市，大致都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从城市规划来说，既有因防御外敌、维护

① 参见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安全而建的城,又有为适应日常生活需要而设的市,以及应这两方面需要的其他设施(当然,非政府机关所在地的市镇一般没有城墙,部分县城也没有城墙);二、从城市功能来说,既是周围地区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有些是全国性或大区域的中心,有些则是地区性中心;三、从居民构成来说,具有人口集中、成份复杂的特点,即有高度的聚居性和异质性;四、精神文化生活较为丰富,人际关系更多的是业缘化而不是血缘化,并有多或少的流动人口,而且,经济越发达,流动人口就越多。

西方的早期城市和中国古代城市具有相同的特点。但在中世纪,西方城市却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和黑暗时代的到来,西方古代的城市大抵成为废墟。美国学者伯恩斯(E. M. Burns)和拉尔夫(P. L. Ralph)在《世界文明史》中对此作了这样说明:

西欧中世纪最古老的城市无疑的是那些罗马时代留下的城市。但是在意大利以外,这样的城市是极少的。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另外一些城市。它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十一世纪开始的贸易再次兴起时的产物。在贸易再次兴起中占领先地位的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意大利市镇。这些市镇的商人们迅速地 and 拜占庭帝国,以及和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强大的撒拉逊城市建立起繁盛的商业。商人们带回来的产品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日耳曼、法国和英国引起了人们大量的要求。其结果是开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许多人模仿生产出近东进口的产品。城市和市镇迅速发展,以致于到了十四世纪,有些地区的一半人口从农业转到

商业和工业。^①

恩格斯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一文中也指出：

早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德国的北部和西部都已纷纷摆脱了封建的野蛮状态，那里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商业扩大了，城市兴起了，市民取得了政治势力。^②

西欧这些从 11 世纪到 14 世纪期间产生出来的城市，与古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这些城市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政治的需要，而是由于经济特别是商业或贸易的需要；二、因此，这些城市不是政治中心，而是经济特别是商业或贸易的中心；三、这些城市不是封建统治者的堡垒，恰恰相反，它们是封建统治的对立物；四、城市居民主要不是封建统治者及其奴仆，而是摆脱了封建统治的商人、手工业主及其家属和雇员。

由于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既与西方古代城市、也与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市民社会构成的差异也就显而易见。

“市民”的概念在西方出现得很早，其内涵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罗马时，“市民”指享有公民权的罗马人，并制定有专门的“市民法”。在中世纪，“市民”则指新兴城市中的居民，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和商人。到 17、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市民逐步分化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由他们所构成的“市民社会”，被马克思称为

① （美）伯恩斯（E. M. Burns）、拉尔夫（P. L. Ralph）：《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0 页。

② 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517 页。

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

“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②

“市民”的概念在中国也出现较早。东汉荀悦《申鉴·时事》说:“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市民又被称为“市人”。《吕氏春秋·简选》说:“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史记·淮阴侯列传》引用了《吕氏春秋》的说法:“(韩)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

由于中国古代民法系统的欠发达,“市民”也与其他概念一样,缺乏严格的法律定义,而前引《史记》、《申鉴》及《吕氏春秋》所说的“市民”或“市人”,既指居住在城市、向官方登记而有市籍的商人,也泛指“市井之徒”即城市中的游手好闲之辈。这种称谓上的习惯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内部结构是分不开的。

《周礼·考工记·匠人》篇所说的“面朝后市”,既是当时城市的基本规制,也为后世的都市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这就是“坊”或“里”与“市”的分离制度。“坊”或“里”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区,“市”则是城市居民特别是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地区。这种坊(里)、市的分离制度在战国时齐国临淄的“大市”、“中市”、“右市”,秦国咸阳的“直市”、“平市”、“奴市”、“军市”、“咸阳市”中可以看出。这一制度从战国一直延续到秦汉、隋唐。城市中坊(里)、市的分离为中国城市的普遍布局方式。^③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251—252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9页。

③ 参见王学理《秦都咸阳》及费正清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8—698页。

据《三辅黄图》，汉代长安城内有 160 个“闾里”；班固《两都赋》及张衡《二京赋》则说长安城中有九个“市”。当时的里和里、里和市之间是用围墙隔开的。在市内营业的商贾立有专门的户籍，叫“市籍”，凡有市籍的商人都应向政府登记并交纳一定的市租。秦的“七科谪”所征发的七种人，有四种与市籍相关，即“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大父母有市籍”者，政府有重大劳役或戍边事，这些人都首当其冲。西汉建立后规定，凡有市籍的商人不得坐车、不得穿丝绸衣服及携带武器，并加重他们的赋税负担，甚至规定，不仅商贾，即商贾子孙也不得做官。

《资治通鉴》载，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太子刘据（即戾太子）起兵杀佞臣江充，驱“四市人凡数万众”，与“丞相军”即政府军作战。胡三省注：“《庙记》曰：‘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此言四市，盖以东、西、南、北分为市也。一说：四市者，东市、西市、直市、柳市。”^①不管“四市”采用何说，刘据所聚集的数万之众均为“市人”或“市民”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些市人或市民，并不是居住在“里”中的一般的居民，而是有市籍的商人及无业游民。四市的商人及无业游民竟达数万人，也可见当时长安城内居民之众。

唐宋时期的都城长安、汴梁等，都筑有三重城墙，由内到外，第一重城墙叫“皇城”；第二重城墙叫“内城”、“里城”；第三重城墙叫“新城”、“外城”。府、州治所在城市的城墙大多为两重，分别被称为“子城”（或“牙城”、“小城”）和“罗城”（或“大城”）。县治所在城市则一般为一重城墙，当然，也有一些县城并无城墙。除了城墙，唐代城市中还有“坊墙”和“市墙”，这其实也是继承了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

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

秦汉时的旧制,它们将居民居住的“坊”(即秦汉时的“里”、“间里”)与“坊”相隔离,也将居民居住的“坊”与商品交易的“市”相隔离。坊墙与市墙都开有门,日出开门,日落关门。也就是说,不仅商品交易,即居民的作息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居民只能在自己所属的坊中活动,商店只能开在规定的市内。居民的所有活动,只能在白天进行。

从唐后期开始,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坊、市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到了五代、宋初,许多城市的坊墙和市墙或者在战争中被摧毁,或者被当地政府所拆除,虽然管理城市居民的坊制仍然存在,但隔离居民与商业区联系的市制却被废除。市的时限和地限已不复存在,商人当街开店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从此以后,“市民”不再特指有市籍的商人及无业游民,而是泛指住在城市的一般居民。^①

比较而言,从11世纪开始,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开始兴起,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得这些新兴的城市或许比起古罗马时的城市更为繁忙,但市民的构成则更为单纯。中国古代的城市从8世纪到10世纪间即唐后期至宋代开始,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但与西方中世纪城市不同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使城市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也使得城市人口的构成更为复杂。一般来说,中古特别是近古时代中国城市人口由以下成分构成:

皇帝及宗室。皇帝住在京城,宗室则通过分封或放逐、禁锢的方式散居在全国各地城市。

^① 参见日本学者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卷一,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338页。

各类贵族。如外戚、功臣、前朝遗老、前贤后裔等。^①

各级官员。在都城,有中央各部门及所在地府县衙门的官员。在省城,有省级各衙门、中央驻省机关及省政府所在地府县衙门的官员。在府(州)城,有府(州)级各衙门、中央及省驻本府(州)机关及府(州)政府所在地县衙门的官员。在县城,有县衙门的官员。在一些经济发达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县城,有时也有中央及省派驻官员(如明代的直隶通州、江西湖口等地即有中央的税务官或采办官)。在市镇,则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派驻的市场管理官员或派出机构(如明代江西浮梁县的景德镇、浙江乌程县的乌镇等即是)。

驻军军官及士兵,各衙门捕快、巡缴等。

城居的乡绅及地主。乡绅包括退休官员、有功名的地方财主,他们有的住在乡村,有的则住在城市;地主一般住在农村,但城市近郊的地主则往往住在城市。

各类侍从人员。如宦官、宫女、侍卫、衙役等。

商人和手工业者及其雇员、学徒等。

各类城市知识分子。如官设私立学校的教师、学生,未仕的举人、生员、监生、儒士等。

服务行业如饭店、客栈的主人,妓院的鸨婆、“王八”,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如妓女、侍女、跑堂、厨子等。

各类文化艺术行当的从业人员,如戏班班主及演员、说书人、说唱艺人等。

^① 张岱《陶庵梦忆》卷二《孔庙脩》记:己巳即崇祯二年至曲阜谒孔庙。孔家人大言不惭地说:“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坐落在江西贵溪县上清镇的天师府和孔府一样,都是历代受封的世袭贵族,故不应作一般的僧道看,而应作贵族看。